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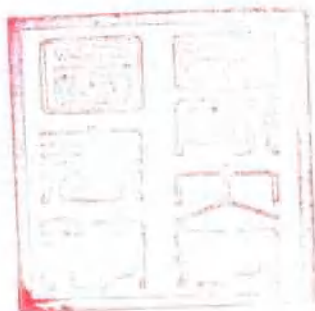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1 3121 8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	黄 雍(1)
复兴社述略	萧作霖(19)
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	祝世康(64)
短稿十篇	
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	王迈常(80)
浙路收归国有的内幕	许炳堃(82)
袁世凯轶事数则	吴弱男(83)
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	张祥麟(85)
民初兵工见闻杂忆	吴承禧(86)
民初清室向银行抵押的一批文物的遭遇	胡仲文(88)
略谈中山舰事件	方鼎英(89)
郭松龄反奉时奉军和日本的勾结	汤国桢(90)
皇姑屯炸车案侧闻	张联棻(92)
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	刘翼飞(93)
回忆川军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但懋辛(95)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	王家桢(115)
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	乐松生(120)

附载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的工作报告…… (140)

附注

对《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

对《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袁世凯轶事数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第三十一辑

对《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对《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

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

黄 雍

一九二四年一月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亲手创办了黄埔军校，来培养新型的革命干部。在民主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形势下，全国各地青年憧憬革命，纷纷投笔从戎，来到黄埔。这个黄埔小岛上，当时真是风云际会，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正如黄埔校歌上所说，“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但是这个“革命摇篮”一开始就存在着革命派和反动派的矛盾：一方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又有以蒋介石为首的许多革命投机分子和反革命派系（像戴季陶、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分子谢持、邹鲁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斗争也日益尖锐。黄埔左派学生中最初出现进步政治组织——火星社，在与校内的西山会议派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随后，在一九二五年底，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以后，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更加剧烈。蒋介石发动三二〇反革命政变前不久，即借故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亦同时取消，另行组成一个完全由蒋介石自己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埔同学会就完全被反革命力量所控制，成为蒋介石镇压人民和革命势力的工具。蒋介石窃取了政权，建都南京以后，黄埔学生气势日益嚣张，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以致当时有人指为“黄虫”、“黄祸”。在这种情况下，各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人人自危，于是由吕超等发起

恢复四校同学会，以谋合力对付黄埔势力。蒋介石为缓和当时矛盾，消除后患计，又命令取消所有军事学校的同学会，并将黄埔同学会名义同时取消，另在中央军校内设一同学调查科，负毕业生登记调查考核之责。此后黄埔学生又走入小宗派的全盛时期，几乎是人人称霸，个个出头。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和利用，一面将黄埔同学会组织形式恢复，改称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一面效法墨索里尼，筹谋建立法西斯组织，借以统一小宗派分歧的黄埔力量，并且把它伸展到青年学生和全国其他各个方面中去，实行法西斯统治。所以他首先根据自己的所谓“力行哲学”组织了力行社，作为“中正式的法西斯组织”的中心，然后以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组织了厚生消费合作社，以谋建立独立的经济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发展力行社组织，蒋介石又成立了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外围，并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时戴笠所建立的特务组织并入复兴社。可是这些法西斯组织越发展，内部矛盾也就越多：首先是复兴社与CC团的火并，其次是戴笠的特务系统与徐恩曾的特务系统各不相容，闹得乌烟瘴气，冲突时起。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二次合作，蒋为掩盖自己的罪恶面目，对中共表示“诚意”起见（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自己的内争），下令解散复兴社和CC团，另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在各地狐假虎威，闹得民怨沸腾后，一九四六年蒋又把它与国民党合并。从此，三青团的全体干事、监事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这一幅新的升官图的展开，使各派系皆大欢喜，暂时满足了群狼争食的要求，同时也把蒋经国的力量伸展到国民党中去。

以上所述，是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的变迁以及后来反革命派系演变为特务组织的一个简单轮廓，下面再逐一加以分述。

火 星 社

黄埔军校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了一部分党员参加校

务领导工作和一部分党员参加受训,但人数不多,难于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这时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军队和军校中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而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又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加以团结教育。因此,由一部分共产党同学和一些同情党的同学效法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创办《火星报》的意义,组织火星社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做些准备工作。

火星社是当时黄埔军校内唯一的革命组织,成立的时间约在一九二四年底,其时周恩来同志已到校担任领导工作,第一期学生已将届毕业。它是由第二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即陈公培)、萧人鹄、吴振民、陈恭、谢宣渠等倡议组织的。参加这组织的人除当时在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学生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前后,参加火星社组织的人数,第二期学生有六十余人,第三期学生约三十人左右,军官佐中参加的人数甚少。

火星社成立不久,在一九二五年初,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进行改选(国民党在各军校皆设有特别党部)。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了竞选运动,结果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获得完全胜利。当选为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作为、罗振声(不久脱党)、黄锦辉(候补执行委员,旋即加入共产党)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蒋介石仅得六十票,没有当选,后来由党代表廖仲恺推荐,才得当了一名监察委员。

火星社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为全校民主创了一个先例,同时也震惊了蒋介石及校内反动派。后来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的借口,说成是“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扩张势力”。

同年九月,黄埔第二期学生毕业离校,火星社亦随之解散。参加组织的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均已先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火星社活动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但在对当时校内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五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危，黄埔同学闻讯，人心颇为不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造谣煽动右翼分子合谋反共。他们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反动理论，企图假借孙中山学说思想为号召，组织反共集团。他们以小宗派为中心，以第二期学生作为发展组织的重点。如以谢廷献、谢纯庵、杨引之为首的川籍同学约二十余人，均与西山会议派有关系，反共最激烈，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此外，史宏熹、杨耀唐、谢振邦等以江西同乡为活动目标，李士珍、周兆棠专联络浙江同学。他们彼此串联，互相声援，使一些中间分子慑于反动势力，不敢有所表示。当时左派同学因受《向导》和《中国青年》两个革命刊物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已有初步的认识，进而追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列主义，逐渐倾向共产主义，从而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更加团结一致了。在这种情势下，黄埔学生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鲜明了。

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前数日，蒋介石集合一、二期学生在校本部举行聚餐，说明东征的意义。席间发现了油印文件，内容大意是：为了“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要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文件是由贺衷寒起草的）。他们在校内由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伍翔、杨引之等负责，在校外由甘乃光等出面，上海由戴季陶直接领导，分头进行活动。这是孙文主义学会酝酿和组织的最初阶段。

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到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在这一段期间内，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逐渐形成。各军中左右派的磨擦日益尖锐；在黄埔二、三期学生中斗争尤为剧烈，打架冲突，时有所闻。当时二期四川籍同学多与谢持、石青阳等西山会议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极端反动的集团。他们常常气

势汹汹，找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伯苍、吴振民等为难。幸周、王等人比较老练，力求避免无原则纠纷，因而没有酿成重大冲突。这些反动分子还常在深夜偷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并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潮汕的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趋表面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驻潮汕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反共积极分子筹备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同时共产党也开始发展组织，于是针锋相对，斗争十分尖锐。当时驻潮汕的第一军全部军官军佐有十分之二参加了共产党，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均居要职，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皆是（贺衷寒那时不在潮汕）。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分子内部因权利之争也有矛盾，如冷欣、孙元良、倪嗣等人反对缪斌、徐锡林，斥缪为“叛徒”，为“共产党奸细”，斥王俊、何玉书、王禄丰等为“动摇分子”。直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孙文主义学会在潮汕方面的活动才渐趋沉寂。

青年军人联合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是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要求而成立的。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的粤、桂、湘、滇各军为了谋求本身势力的发展，各设有军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并抽调自己部队中青年干部加以训练。上海五卅大惨案发生后，广东工人阶级为声援上海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省港工人的英勇斗争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莫大的鼓舞。在各个军校受训的青年在这种革命形势激荡之下，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的高贵革命品质和坚决的斗争意志所感染，革命情绪更加炽烈，要求共产党帮助和教育的愿望也更加迫切。黄埔军校的革命派同学为了适应这些青年军人的要求，在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以军校特别党部名义派第二期工兵队学生王一飞（后为共产党员）为代表，到广州经常参加广东的工、农、商、学、兵各界的联系会议，

还与粤(李福林部)、湘、滇、桂各军所办的军事学校学生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发刊小型月刊《青年军人》。这就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的开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和具体的活动方针。到是年九月间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将届毕业时,经共产党组织决定,派第二期辎重队学生周逸群担任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到了二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规模粗具,开始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当时活动范围主要在黄埔军队本身,并兼向驻在广东境内的第二军(湘军)、第三军(滇军)、第四军、第五军(均粤军)、第六军(程潜部)各军中扩大影响,发展组织。至此,青年军人联合会已成为军队方面团结革命派军人的唯一组织,对各军中以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右派为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革命活动,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其组织已遍于广东各军,并向国内各军寄送刊物,扩大影响。由于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深入,当时驻粤各军风气为之为一变。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为了挽回他们的失败局面,故意在群众中制造和扩大纠纷,企图借此来加强反革命势力的内部团结,争取蒋介石对他们的支持。蒋介石固敌视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青年军人中的组织活动,亟思拔去这一眼中钉,面对孙文主义学会虽赏识其反动活动,但认为这一组织究竟非自己亲手培植,恐将来难于切实掌握。因此,在三二〇事变前不久,蒋介石就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同时为表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精神,亦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并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由他自己直接领导。

黄 埔 同 学 会

蒋介石在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以后,为了排除共产党与西山会议派,将黄埔同学置于自己一手

控制之下,决定另组织“黄埔同学会”。于是他指派蒋先云(共产党员,校长办公室秘书)、曾扩情、贺衷寒、冷欣、余洒度、贾伯涛、伍翔、杨引之、李之龙、潘佑强、田载龙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自任会长,意在实行“一军一党,以军制党”的预谋。黄埔同学会内部组织设有组织、宣传各部,在各军中设立分会和基层小组,另设抚恤委员会办理伤亡同学优抚事宜。会址设于广州东较场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这是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作为一己工具的开始。此后随着北伐军事的进展,黄埔学生到达哪里,这一组织就发展到哪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分家,黄埔同学会从此就完全掌握在右派学生手中。当时大江南北,到处皆是“五皮主义者”(五指指皮带、皮靴、皮鞭、皮包、皮裹腿,是当时黄埔学生最时髦的装束)的天下。这时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已成为蒋介石对付异己、摧残革命的有力机构了。

蒋介石在背叛革命,篡夺了政权后,由于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两大系统:一为他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一为收容改编的杂牌部队,而在数量上,中央嫡系又弱于杂牌部队。他就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丁的手段来操纵驾驭,并决定调整改编杂牌部队,因而使杂牌部队的军人感到人人自危。这些军人见到黄埔系统有同学会组织,既能团结发展,又可畅所欲言,于是有四川吕超(以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参军长)等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乘机以团结自存为号召,发起恢复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之四校(将弁、陆小、陆中、保定军官)同学会组织,作为他们自己的政治资本,借谋与蒋抗衡。吕等发起后,响应者大有人在,最积极的莫如江西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和湖南的唐生智亦表同意。当时他们的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军人之势。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将为心腹之患,因而他就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以总司令名义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分散团结的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他在表面上首先命令取消黄埔同学会,但实际上不过将黄埔同学会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

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的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并保留原来的抚恤委员会,由是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来训练他所需要的干部。因此,各兵种均设有军官学校,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宪兵学校、海军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等,各校在各地还设有分校。除此而外,还有因人因事而设的各种短期训练班等。所有各校校长一职均由蒋介石自兼,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为了统一军事教育,实则为法西斯教育的雏形。军事学校漫无限制发展的结果,学校名目繁多,据一九三五年统计,训练单位就有百余个,而以一小小军校调查科实难胜任这些川流不息的毕业同学的组织、调查、登记、考核等工作。同时,这个调查科又由于职权范围所限,在各军校毕业生的分发调度上亦难以应蒋介石运用自如的要求。这时各军事学校又有组织同学会的情事,如杭州的空军学校政治部主任蒋坚忍就倡导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即严厉训斥该校师生不得破坏团结,并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但此事发生后,更促成了蒋介石改组扩大调查科的决心。不久他即将调查科改组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名义上改隶于军事委员会(后又改隶军政部),在各军、师单位和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分处,其经费由各隶属机构列为正式预算,各军、师、省、市分处负责人由中央处聘任。他又将以前所有各种训练团、队、班等训练机构共百余单位的受训学员,一律加以甄别,按毕业时间之先后,重新编配,并入中央军校各正式期班,享受正式期别待遇。如在广州的政治训练班与六期同时,就编入军校第六期,作为正式

第六期生看待。至此，黄埔同学会实质上不仅重新恢复，而且较前更为发展，只是在名义上有所不同而已。蒋又将抚恤委员会取消，其抚恤业务由调查处办理，并规定调查处有介绍或呈请分发失业同学工作之权。

九·一八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要求，仍然坚持“剿共第一”的方针，并且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剿共必先集中各军意志”的反革命口号。他除自己坐镇南昌主持“剿共”军事外，叫邓文仪在南昌行营中成立调查课搞军事情报和特务活动，以辅自己耳目所不及。又命陈诚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将全国各军高级将领分期分批集中轮训。训练的目的在于：动员全国军事力量一致“剿共”；训练的措施是：灌输“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宗旨。训练团学员毕业时由中央毕业生调查处依照毕业生登记手续发给同学登记证，证明已取得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这样，所有受过训的高级军官也就都成为蒋介石的“学生”，同时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又可扩大其控制范围，深入到各个非嫡系的杂牌部队进行活动。抗战时期在重庆浮图关举办的中央训练团，后来选训人员由单纯的军人扩展到行政各部门人员。这些非军人的员生，毕业后也均归口于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这样一来，这个调查处的活动范围更从军队部门扩展到各个行政部门中去了。这个训练机构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

争权夺利的小宗派

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贯漫无限制地发展军事学校，以培植其军事爪牙。中央各军校除本校外，又在武汉、长沙、西安、桂林、成都各地设立分校；各分校中除正式期别外，还设立若干短期训练班。由此，军校毕业生日益增多，而失业的学生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兼之，各部队贪污吃空之风盛行，每师规定

人数约一万二千人,实则最多不到八千人,甚至只有四五千。各部队长为便于营私舞弊,都各自在部队中排除异己,形成了封建小集团,所需干部均由自己队伍内选拔训练。因此,中央毕业生调查处呈请军政部分发到各部队的同学,每每经年得不到实缺,反而借故被排挤走。当时以南京一地而论,失业同学曾过千人,打架闹事,时有所闻。斯时的调查处实际上成了失业同学的救济处,排难解纷成为唯一的业务。这种循环失业状况已成长期不治之症。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央训练团迁南京孝陵卫时,还演出了一场中央训练团内的黄埔学生齐集中山陵哭灵的活剧。

虽然蒋介石竭力用种种方法企图统一黄埔学生的思想,控制黄埔学生的意志,并且在形式上统一和加强了黄埔同学的组织,但其结果仍然是枉费心机。黄埔学生中由于权利之争,形成了许多小派系:鄧悌(驻德武官)以留德、法、意、比学生为基础,与唐纵(驻德副武官)、顾希平(留法)、刘璠(留比学警察)、汤武(留意)等人结合,组织留欧集团。他们自以为在德意等国留过学,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懂得较多,就向蒋献计,仿德、意先例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正暗合蒋介石之意,鄧悌得蒋欢心,获任复兴社书记,实种因于此。不甘寂寞的贺衷寒又想重温孙文主义学会的旧梦,以张镇(宪兵司令)、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等为基干结成留俄派。以袁守谦(政训总处秘书长)为中心的政训系统也加强了组织。潘佑强、周复、杜心如、彭孟辑、李一民等则结成留日学生小集团。康泽则以北伐时宣传大队为基础,以三期云、贵、川籍学生韩文焕、毛嘉谋、雷清尘、贺明暄等为中心,成立西南社。戴笠借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机,以调查敌我军队内部情况为名,向蒋献策组织十人团,由此发展成为特务组织。刘健群当时充何应钦秘书,又借何的关系,上书蒋介石建议组织蓝衣社。这一群乱世妖魔,在互相攻击、相互争宠的斗争中,把整个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

力行社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由于自己的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奉送给日本，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一致要求他改变其卖国政策，积极抗日。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凭借的黄埔力量，也是问题重重，危机潜伏。他的嫡系军队贪污腐化之风盛行，逐渐走上北洋军阀部队的老路，对他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使他无法贯彻自己一意孤行的意志。而最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在政治上活动的一些黄埔学生，派系纷歧，互相磨擦，各不相容。当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不但对在淞沪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不予积极支持，甚至当他的嫡系部队八十七师宋希濂率全旅官兵齐集南京尧化门自动开赴上海参战时，也多方留难。最后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派八十七师王敬玖部和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组编第五军，派张治中充军长，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不料八十八师开抵昆山南翔前线，与敌一触即溃，调赴后方常熟整训时，全师官兵不到四千人。蒋介石接戴笠报告后大为震惊，对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命运所系的黄埔系统力量的前途不得不从新考虑，以加强控制。于是他除了决定把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把国府主席让与林森，而自己则退居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借图转移空气、和缓全国舆情而外，又提出“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等口号，以防大权旁落。他一面令戴笠加强特务组织，成立特务处于南京鸡鹅巷；一面接受鄧悌的建议，以他自己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法法西斯组织，成立力行社，自任社长。力行社组织形式完全采取集权制。社以下设若干小组，每周在蒋介石的官邸（军官学校内）召集组长联席会议一次，由蒋自己讲解“力行哲学”，并研究德、意法西斯组织形式和发展等问题。力行社参加分子除以黄埔学生中的政治干部为基础外，并吸收一部分文人和留学生，但不吸收在部队服务的黄埔学生参加。

他又将驻意公使刘文岛升格为大使，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送德留学，并调回大批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法西斯组织工作。当时参加这一核心组织的人有：鄧悌、贺衷寒、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刘咏尧、萧赞育、黄雍、顾希平、滕杰、冷欣、蒋坚忍、曾扩情、周复、杜心如、陈绍平、易德明、李一民、彭孟缉、康泽、严不严、梁干乔、余酒度、郑介民、戴笠、俞塘、张辅邦、田载龙、唐纵、潘佑强、刘健群、范汉杰、孙元良等约五十余人，并决定这一组织为核心组织，不再发展；另由军校毕业生调查科出面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作为外围，发展组织。但这个外围组织因政治性不强，发展有限，后又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同志会，亦即中华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正式外围组织。

复 兴 社

复兴社社长由蒋介石自兼。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设书记长一人，秉承“领袖”意志处理一切日常会务。下设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各省市设分会，机关团体设支会。支会下分小组，为基层组织。

第一任书记长经蒋介石指定滕杰充任，因能力弱，不久即去职，由鄧悌继任。鄧为留欧派领袖，本可胜任，但由于他个性强，与各派磨擦日甚，为贺衷寒联合留日派所反对而下台，先由邓文仪代理，后由贺衷寒继任。贺为留俄派和政训系统领袖，又曾留学日本，在复兴社中颇占优势，但接任书记长后亦因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满，有失蒋欢。西安事变时贺主张拥何（应钦）代蒋，对张学良用兵，蒋回京后不得不引咎请辞，由刘健群继任。但刘因非黄埔学生（滕、鄧、邓、贺皆黄埔一期生），不久即被排挤走，由康泽继任。复兴社存在时间虽暂，而五易负责人，多为小宗派内部斗争所致。组织处长周复为黄埔军校三期生，系留日派中心人物，周调

监事会负责后,由第四期学生易德明接充。宣传处长为邓文仪;军事处长为桂永清;特务处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完全是特务原班人马。原戴笠特务组织虽已具雏形,但经费未固定,纯由蒋之特别费中开支,因为数颇巨,颇遭物议。复兴社成立后,蒋特令将特务组织并入复兴社中加设特务处,并规定它的人事调配和工作进行均归蒋本人直接处理,不受复兴社组织支配。

复兴社的主要“使命”有三:第一,对付当时青年运动,打击共产党,把组织工作伸展到青年学生中去;第二,企图将蒋介石的势力伸入北方,打进杂牌部队中,对杂牌部队起分化收买作用;第三,对CC组织和CC的特务组织取监视态度。

刘健群任复兴社书记长时,曾建议收容失业的黄埔学生组织宣传队北上宣传,发展复兴社组织。他卸任书记长后,蒋即令其组织华北宣传总队(分若干大队),率领北上,并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名义,将宣传队分配到华北各军如宋哲元、冯占海等部中,每军宣传队派有重要复兴社分子主其事。鄧悌任书记长时就集中精力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他首先利用训练总监部名义办理全国中学生暑期集中军训,在全国重要省市组织集训总队,由当地驻军高级将领或派专人任总队长,将全部在校的高中学生集中训练。另由复兴社遴选工作人员于各总队组织政训室,并由蒋介石指派力行社干部充总队政训主任,掌握政训工作。如上海市集训总队设无锡,总队长由驻军八十七师师长王敬玖兼任,派顾希平任政训主任。又如在河南开封集中豫、陕两省高中学生训练,派曹利生充总队长,政训主任调黄雍担任。每个政训室均在当地复兴社调用大批组训人员担任学生中的小组指导员。学生集训时,政治训练多于军事训练。政治课程有“领袖言行”、“三民主义”、“各国形势”(着重于德、意法西斯组织和发展),训练内容特别强调灌输“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精神,要在全中国青年中养成“敬爱领袖”的风气。任何人只要一提到或者听到“委员长”,必须即时起立致敬。

训练总监部内又成立国民军训处，由复兴社初保潘佑强任处长，后又改为杜心如，李骧骥为副处长（均为黄埔一期学生，日本步兵学校毕业）。各省市亦设国民军事训练处，大专学校置军训室，派军训主任，各中学派军事教官。从此，复兴社组织就伸展到各大、中学校，法西斯毒素也就蔓延到青年学生中。复兴社最主要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图谋彻底消灭共产党组织。他们配合戴笠特务系统，在各校横行无忌，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进步青年遭绑架残杀之事时有发生。当时 CC 特务组织是着重在搜括民脂民膏，他们勾结大流氓杜月笙贩运鸦片烟，在上海设厂制造吗啡。蒋介石就采用“以毒攻毒”办法，令戴笠加强特务组织，以与 CC 特务组织互相牵制。戴笠就在南京明瓦廊黄埔同学会旧址设训练所，以共产党叛徒顾顺章为顾问，加紧训练特务，并派人打进 CC 特务组织，将制毒机关破获，以打击 CC。戴又利用自己的青红帮关系，将训练成熟的爪牙打入青红帮，自己又与杜月笙结拜为盟兄弟，期在青帮中取得与杜相等的地位。他又以蒋介石为护符，获得各地驻军将领的协助，运用复兴社和中央军校调查处组织关系将特务组织伸展到每一个角落，羽毛逐渐丰满，即开始向 CC 特务进攻。结果弄得 CC 与复兴社成为势不两立的局面。抗日战争中，CC 特务与上海汉奸勾结，在河南界首、浙江金华大批走私，而戴笠对上海工作亦早布置，在明争暗斗中与 CC 特务狭路相逢，因而不断地发生武装冲突。

此外，鄧悌还运用国民军事训练机会，在机关团体中大量发展复兴社组织。当时仅就南京一地，每周宣誓入社人数多达五六百，至少亦在三百以上，宣誓仪式均假勵志社礼堂举行，由蒋介石亲临致训。鄧悌任书记长时为复兴社发展极盛时期。

中统、军统及其他特务系统

蒋介石统治下的特务，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他控制这些